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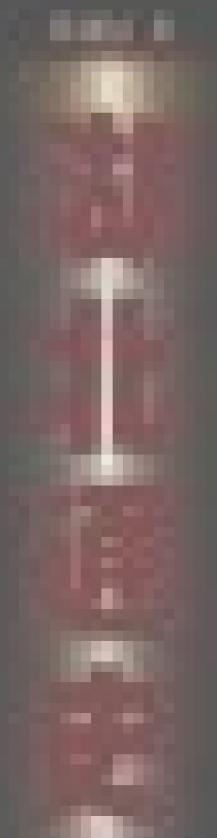
B T

张建民 著

湖北通史

〔明清卷〕

章开沅 张正明 罗福惠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明月夜

明月夜 醉人歌 歌舞升平
新嘉坡大華影院

湖北通史

张建民 著

明 清 卷 H B T S

章开沅 张正明 罗福惠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武汉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北通史·明清卷/张建民著.一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6

(湖北通史/章开沅,张正明,罗福惠主编)

ISBN 7-5622-1971-0/K·128

I . 湖… II . 张… III . 地方史-湖北-明清时代 IV . K29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6335 号

HUBEI TONGSHI MINGQINGJUAN

湖北通史·明清卷

©张建民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周柏青

封面设计:甘 英

责任校对:潘昌胜

督 印:朱 虹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3.5

插页:4

字数:588 千字

版次: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定价:4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本卷所述,是自明王朝建立(1368年)至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间约470年湖北地区的历史。

这一时期,是今之湖北湖南两省行政建制由合到分,湖北省行政区划最终确立的时期。1364年朱元璋部击败陈友谅部,占领武昌,建立湖广行中书省,辖区范围与后来的两湖大致相同,奠定了湖南湖北两省合治的基础。明王朝在湖广统治的实践,又为两湖分治提供了经验和依据;而万历年间分设南北两学臣,则体现着两省分治的趋势,亦可视为南北分省的先声。入清以后,南北分省的趋势更为明显,至康熙三年(1664年),正式分省。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域,湖北的辖区范围、行政建制格局基本确定。这一变化结果,对于湖北的历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一时期也是湖北地区经济、社会乃至自然发生巨大改观的时期,这种改观正是明清时期湖北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

社会经济的改观首先表现在人口变迁方面,尤以人口的流动为关键。为人们所熟知的中国人口史上所谓“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的两次大规模人口流动,均与湖北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以两湖为枢纽。从鄂东、鄂北丘陵到江汉平原、鄂西北山区乃至鄂西南山区,尽管时间上不无早晚参差,但都能看到大量外地流民、客民、移民落居的记载。在平原湖区,“湖多易淤,土旷易垦,食物旋给,他方之民聚焉,而江右为甚。强者侵产,弱者就食,故客常

浮于主”^①。在丘陵山地，“生齿日繁，流集日众”。鄂西北山区为有明一代流民渊薮乃众所周知，其规模达数百万之众，其中一大部分入籍落居。“流徙日聚”，“五方杂处”，“客处浮于土著”，成为明清时期湖北大部分地方的共同现象。而移民的来源，见于记载的以江西为最多。

在外地人口大量落居湖北的同时，也有湖北境内人口流移外地的现象发生。同一时期的人口流动有进有出，成为明清时期湖北人口变迁的一大特点。外流的湖北人以落居四川者为最多。这种状况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说基本吻合。不过，从总体上讲，湖北人口的外流不及外地人口落居湖北的多。另外，“江西填湖广”也好，“湖广填四川”也好，并不限于清初，而是始自元明之际的持续数百年之久的人口流动。其间，受人口自身状况、社会环境诸因素影响，形成了元末明初、明后期、明末清初等几个高潮时期。人口流动所及，亦不限于江西、湖广、四川三地区，而是以三地区为主线，牵动江、浙、闽、广、皖、豫、陕、黔、滇诸省的大范围人口迁移；而且，不排除流动过程中有连环滚动、递进机制的存在，包括湖北境内人口的区间迁移。

人口的变迁，尤其是大量外地流民、移民落居湖北，对湖北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明清时期湖北经济、社会乃至自然的巨大改观，即肇始于此。

农业经济的增长是明清时期湖北社会经济面貌改观的主要内容，土地的垦辟则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条件，无论是平原湖区还是丘陵山区，农业垦殖的规模和程度都是空前的。所谓“先是山泽之羨，率弃不理，今则皋隰原阪，耕者鳞集，甚至丛菁幽草，人力所

^① 嘉靖《沔阳志》第9卷，“食货”。

不能通者，亦皆累累象耕鸟耘，称常稔焉”^①，正是一幅生动的农业垦殖扩张图画。

作为平原湖区低地利用的主要形式，有两湖特色的垸田在明清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仅仅是垸的数量增多，“星罗棋列”，“堤垸如鳞”；垸田的面积扩大，“往时受水之区，多为今日筑围之所”，“昔为菹茹，今称沃衍者不啻万万”，垸的规制、质量也在提高。垸内不仅设有蓄水之湖塘、排泄之沟港，而且建有各种闸、剅，以时启闭排灌，在防御水旱灾害，保证农业生产丰收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丘陵山区的垦殖，主要通过砍伐森林、刀耕火种的途径和方式来进行。在记述这一时期山区农业垦殖活动的诗文中，充斥着诸如“深林幽谷，开辟无遗”，“峻岭丛林，剪伐殆尽”，“散木良材同一炬，年年十月便烧山”，“黄茅白苇何足惜，中有梗楠高百尺”，“烧畲为田”，“木拔道通，虽高岩峻岭，皆成禾稼”之类的内容。在大面积森林垦辟为耕地的同时，许多青山也一变而为童山。

不可忽视的是，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湖区，在农业垦殖过程中，外来移民、流民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地方志及其他有关文献的众多记载表明，正是在大量外来流民集聚、移民落居的推动下，才形成了这一时期农业垦殖不断向更进一步的深度和广度扩张的局面。明清时期湖北农业垦殖所具有的这一重要特点——由外来流民、移民担当垦殖的重要角色，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农田水利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平原湖区以堤防为命，丘陵山地则惜水如血。江汉堤防的系统化即完成于这一时期。至于支堤垸堤，更是“龙腾蛇跃”，“蜿蜒曲折”，越修越长，越修越多。为蓄水、引水灌溉而修建的塘、坝、枧、陂、堰、渠、圳之类的设

^① 《楚均田议》，见章潢《图书编》第39卷。

施，遍布各地。引水设施有“越翻冈岭”者，有“穿岩渡峡”者，有“因石泉而梳流者”，远者达数十里之遥。可知农民为农田水利建设想尽了办法，更付出了艰辛劳作，可歌可泣。另一方面，对于农田水利设施的修建、防护以及防汛、灌溉用水分配等方面的组织管理，历代积累了不少经验，至明清时期则集之大成，制度、规章乃至必要的组织，都趋于健全和完善。其核心原则是受益与负担相对应，灌溉用水，按照田地面积分配；灌溉设施的维护，则按照受益田亩分摊所需人力、物力或财力。垸堤修防负担，照垸内受保护田地面积分摊，江河干堤、支堤的修防，也大体上贯彻着同样的原则，在受益的若干县区间分摊，以至于田地买卖之时，必须在契内注明应修堤防的长度。

水利工程修防中普遍存在着官督民修的方式，有时甚至连一些小规模的工程设施也必须示以官府权威才得见功效，从创建、分水、防汛、维护，人力的组织、资金的筹集以及纠纷冲突的协调，官府的作用或影响似乎无处不在。当然，绅衿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现象不仅是湖北，也是中国水利史值得深入研究的。

农业经济的增长首要体现在粮食产量的增加上。明清时期湖北粮食生产增长，是耕地面积扩大、水利发展、作物品种增加和耕作制度的改进、耕作技术水平的提高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因素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区所起作用的大小、影响程度的高低各不相同。其间，耕地面积的扩大一直是粮食总产量增加的主要条件，水利建设的保证作用则如前述。到清代前期，玉米、红薯、马铃薯等高产新作物的推广则不仅成为影响粮食产量的主导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广大地区劳动者的生活。因为玉米等作物品种既对生长条件要求不高（相对于稻作而言），适宜旱作，又能获得较高产量，是农业垦殖进一步扩张的重要条件。

正是这类作物的推广,使大面积原本认为耕作条件较差、甚或不宜农耕的土地得到垦辟利用。可以说,如果没有玉米、红薯、马铃薯之类作物的引进推广,明清时期的垦殖扩张难以达到如此深广的程度。由于玉米之类的种植遍布新垦辟的山地,山区广大劳动人民多以此类产物为主食,因此,明清时期的饮食结构变化也很显著。

粮食大量运销外地是明清时期两湖地区粮食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广泛流传,则是两湖粮食运销外地的很好说明。不过,对于粮食运销外地所反映的具体内涵,还须加以深入的考察、分析。结果表明:耕地面积广大,且人口相对稀疏,是明代湖广得以有较多余粮运销外地的主要条件。特别是与当时在全国处于领先发展水平的江浙地区相比较,尽管江浙地区有仰食湖广米粮、甚至有“吴以楚食为天”之说,尽管有“楚中谷米之利,散给海内几遍矣”之谓,却不能因此而断言湖广的生产水平已超过江浙,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其他如商品经济(包括商业性农业)发达程度、漕赋税额大小等因素对粮食之余缺亦不无影响。如果考虑到洪涝等灾害给湖广粮食生产造成的极不稳定性:“岁丰则郊原露积,箫鼓报赛,洵为乐土;一值水潦即荡析离居,甚者漂溺相枕”;“阳侯不怒,则收倍旁邑”^①,亦不排除“湖广熟,天下足”谚语中含有某种程度上的假设之意。至于记载中的“湖广米粮”、“楚米”等说法之中,湖南、湖北各自占有何等地位,亦即湖北米粮在运销外地的两湖米粮中占有多少份额,也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湖南米粮外销量无疑较多,在运销外地的楚米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但若说湖南米等于楚米,或者说运销外地的湖广米粮、楚米中并无湖北米粮却太绝对。对于进出汉口的米粮宜作审慎的

^① 同治《监利县志》第8卷,“风土”;第4卷,“田赋”。

理解、判断,从汉口运销外地的米粮当然不全是湖北所产,可外地运进汉口的米粮亦非全部供汉口或湖北其他地方消费了,也不能因为存在外地米粮接济汉口的情况而否定湖北有余粮运销外地。

明清时期是中国人口史上人口增长较快、人口压力增大的时代,明中后期及清中期出现的大规模自发人口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属人口压力所致。在这个时期中,湖北的广大地区,特别是山区,接纳了为数可观的流移之民;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除养活本地人口外,还有余粮运销外地。所有这些,从缓解人口压力的意义上讲,都是不可忽视的。

当然,明清时期湖北农业经济的增长,并不限于粮食生产,经济作物如棉花、药材、烟草等的种植,经济林特产品如生漆、桐油、茶叶、白蜡、木耳、清油等的生产经营,无不具有较丰富的内容,也都获得了相应的发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现在回过头来进行历史考察,不难发现当时对上述诸种经营重要性的认识尚有待提高,特别是山区林特产的优势并未充分发挥。有些品种在不合理的农业垦殖冲击下,甚至呈萎缩趋势。

湖北历来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但是,相对于米而言,鱼受人们重视的程度就低多了。渔业生产如是,渔业史的研究亦如是,远不及米。其实,以淡水捕捞为主的渔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江汉平原尤其如此。以明代为例,从河泊所的设置数量和渔课的征收数量,特别是这些项目在全国所占的比例中,已经能够看出淡水捕捞在湖北曾有过的规模及重要性。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变迁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手工业而言,发展最为显著的是棉纺织业。棉纺织业在湖北的发展肇始于明,大发展于清。约至清中期,湖北境内几至于无地不纺织,而且形成了一批大小不等的棉布生产中心,创出一些较为有名的棉布品牌。宜城、江陵、云梦、安陆、监利、随州、汉阳、孝

感、应城、蕲水等地所产棉布，进入市场的比例相当大，产品行销范围相当广，记载中所见达滇、黔、秦、蜀、晋、豫、皖、苏、粤等十数省。明清时期的手工业，从理论上讲是更有活力的产业，若能突破传统的局限，当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不过，从当时湖北的状况看，尚难显出此种趋势。即以较为发达的棉纺织业论之，绝大部分仍局限于单个农民家庭的手工生产，而且以利用农隙、冬闲时间纺织为主。更有一些地方以不习技艺为能事，百工之需，皆来自外地。

就商品交换言之，商业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以集市城镇为主干的市场发育程度。湖北拥有发达的水陆交通条件，有“九省通衢”之称。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的数量增加，手工产品投入交换领域的比重也在加大，地区间经济联系加强，商品流通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尤以长江、汉水沿岸形成的一批大小规模不等的市镇引人注目，为首者理所当然是汉口，堪称特大型市镇，为当时“天下四聚”之一。其次如沙市、宜昌，再次如阳逻、涴市、樊城、巴河、董市、老河口、宋埠、仙桃、刘家隔、朱家河等，加上农村无数的小集场，基本上构成了系统的商品交换网络。明清时期的湖北市镇，大多属商业性市镇，商品流通功能显著发达，而商品生产相对薄弱。沿江大市镇如汉口、宜昌、沙市等，更是以转口贸易为主，这是湖北市镇相对于其他地区市镇，特别是相对于手工业发达的东南地区市镇而言的一大特点。

这一时期，特别是明代，被称为历史上湖北人文鼎盛的第三个高峰期。在较为系统的学校制度以及书院制度的支持下，湖北的教育、文化各有发展，科举兴盛，人才辈出，虽然尚不及江苏、浙江和江西，却已居全国中上地位。学术界如嘉鱼“二李”，黄安“三耿”，应城陈士元，沔阳童承叙，京山郝敬、高岱，通山朱廷立，德安何迁，天门胡承诺，汉阳熊伯龙，孝感熊赐履，黄安曹本荣，应城程大中，汉川秦笃辉，江夏彭崧毓，蕲春李时珍，罗田万全，钟祥李潢，

江夏刘湘煃，黄冈陈大章，京山李元等；文学家如公安派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竟陵派钟惺、谭元春，黄冈杜浚，蕲州顾景春，黄梅喻文鳌，蕲水陈沆，天门刘淳等；艺术家如江夏派创始人吴伟，孝感程正揆等，皆各有建树。

科举所选人才大多入仕，其间也有一部分成为著名大臣者，如明代之石首杨溥、袁宗皋，嘉鱼吴廷举、李承勋，江陵张居正，京山李维桢，江夏郭正域、熊廷弼、贺逢圣，谷城方岳贡，随州何宗彦，应山杨涟等；清代之江夏吴正治，孝感熊赐履，麻城鲁之裕，黄梅帅承瀛，蕲州陈銮等。

约自宋代始，南方诸省区人文进步迅速，渐显超越北方之势，明代湖北人文之进步，从“两汉至明代南方见于史传的著名人物数统计表”中得见一斑。

两汉至明代南方见于史传的著名人物数统计表

朝代		省份		广东	广西	湖北	湖南	江苏	浙江	江西
		人数	占全国比例							
两汉	665	0	1	18	2	36	16	3		
	100%	0	0.15%	2.7%	0.3%	5.41%	2.4%	0.45%		
唐	1 149	3	0	23	2	76	32	2		
	100%	0.26%	0	2%	0.17%	6.61%	2.79%	0.17%		
两宋	2 065	7	8	33	24	146	220	164		
	100%	0.34%	0.59%	1.6%	1.16%	7.07%	10.65%	7.94%		
明	1 771	50	13	76	27	241	288	204		
	100%	2.82%	0.73%	4.29%	1.52%	13.61%	16.24%	11.52		

资料来源：罗福惠《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武汉出版社，1994年，第7页。

若就省内进而言之，自学校、书院、科举诸成绩及各领域著名

人物计，似以鄂东之黄州、武昌二府为盛，以至明代就有人注目于此。著名学者王士性称：“蕲、黄之间，近日人文焕发泉涌，然士风与古渐远，好习权奇，以旷远为高，绳墨为耻，盖有东晋之风焉。然其一段精光亦自铲埋不得。”^① 清前期虽较明代逊色，却也不乏可称可表的内容。

在这 470 年间，湖北地方社会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迁，不过，一些具体的变化仍在逐渐地发生着。前述人口变迁，除了在资源开发、农业经济增长方面的影响外，对人口问题本身及社会其他领域亦不无影响。大量的流移人口落居，不仅造成了较大的人口基数，影响到此后人口数量的变化，而且对湖北地方原有的包括宗族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土客矛盾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不无表现，而五方杂处的人口结构，对社会生活习俗的影响尤为广泛、显著。从“五方杂寓，家自为俗”，到“聚处日久，俗亦渐同”，既反映着社会生活习俗演变的趋势，亦是民俗变迁的基本规律。

较之其他地区，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变迁更为剧烈。少数民族社会自身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汉族人口迁居，多方因素促成的日益频繁的相互交流，共同决定着鄂西南地区社会变迁的趋势。自明代的土司制度到清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推动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变迁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农业生产的实质是人们通过劳动进行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生产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势必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因此，不能只讲经济增长而完全忽视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变化。在明清时期的垦殖扩张过程中，随着宜农土地的垦殖趋向饱和，条件相对较差、难度相对较大的周边山区、河湖沼滩等成为垦殖扩大

^① 王士性：《广志绎》第 4 卷，中华书局，1981 年，第 92 页。

的主要对象,加之垦殖活动受生计压力、流民意识等影响,难免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粗放性,从而导致一系列消极的生态后果,主要表现如森林植被的过度耗费乃至破坏,而童山濯濯又引起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进而致使河湖淤积,加剧干旱和洪涝灾害。森林植被的破坏,还对生物资源造成不良影响,经济林特产减少,动物失去藏身之所等等,都已成为无可忽视的问题。

具体考察明清两朝在湖北的统治,各有特点,其间也发生过诸多变化,但是,统治的性质却相同。其间,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曾多次发生,引发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却无法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和压迫。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外国势力开始逐渐渗入中国社会,湖北的历史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明王朝在湖北的统治	
第一节 明湖广行省中的湖北政区	(3)
一 湖广行省的建立	(3)
二 湖广行省中湖北政区的变动	(6)
三 湖北境内明朝行政区划	(10)
四 施州卫:特殊的行政区划	(14)
第二节 地方行政机构与基层社会控制	(18)
一 地方行政机构设置	(18)
二 里甲制度及其功能	(23)
三 湖北的里甲编制及其演变	(30)
第三节 明代湖北境内的卫所分布与地方治安	(37)
一 卫所分布	(38)
二 巡检司与地方治安	(45)
三 军事指挥制度	(53)
第四节 朱明宗藩与湖北地方社会	(59)
一 明代宗藩在湖北地区的分布与衍化	(59)
二 宗藩与湖北地方政治	(71)

三 王府庄田与土地扩张 (78)

四 王府王庄对地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93)

第二章 清王朝在湖北的统治

第一节 湖北省政区的形成 (113)

一 两湖分省过程考察 (113)

二 基本行政区划的设置与变动 (123)

第二节 地方行政机构与基层社会控制 (124)

一 总督巡抚制度与地方行政机构 (128)

二 里甲制和保甲制 (141)

第三节 湖北的八旗驻防与绿营分布 (149)

一 八旗荆州驻防 (156)

二 绿营与屯田卫所分布 (158)

第四节 鄂西土司与改土归流 (171)

一 明代鄂西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172)

二 清初的鄂西土司 (178)

三 鄂西土司地区的改土归流 (181)

第三章 明清时期湖北区域社会的动荡

第一节 明代湖北区域社会的动荡 (191)

一 明早期的社会动荡 (191)

二 明中叶的流民起义 (193)

三 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 (201)

四 明末农民战争在湖北 (206)

第二节 清前期湖北区域社会的动荡 (210)

一 清初湖北地区的抗清斗争 (210)

二 清中叶湖北的社会动荡 (219)

第四章 农业生产力与粮食生产

第一节 平原湖区低地的垦殖	(231)
一 明代江汉平原垸田的演进	(231)
二 清代江汉平原垸田的演进	(236)
第二节 鄂西山区的土地开发	(242)
一 明代鄂西北山区的开发	(242)
二 清代鄂西北山区的开发	(245)
三 鄂西南山区的开发	(249)
第三节 农业水利的发展	(253)
一 堤防的系统化	(253)
二 堤垸的修防管理	(256)
三 碴塘堰灌溉水利	(268)
第四节 农作制度与技术	(281)
一 新作物的引进与推广	(282)
二 稻麦品种及其分布	(288)
三 多熟制的发展	(296)
四 农具	(298)
第五节 粮食生产的增长	(300)
一 从“湖广熟,天下足”谈起	(301)
二 清代垸田与湖北粮食生产	(306)
第五章 多种经营及农业生态环境的演变	
第一节 经济作物与经济林特产	(319)
一 经济作物的种植	(319)
二 经济林特产品	(325)
第二节 淡水捕捞业的兴盛	(335)
一 淡水捕捞业概述	(336)
二 明代渔课与渔业	(346)